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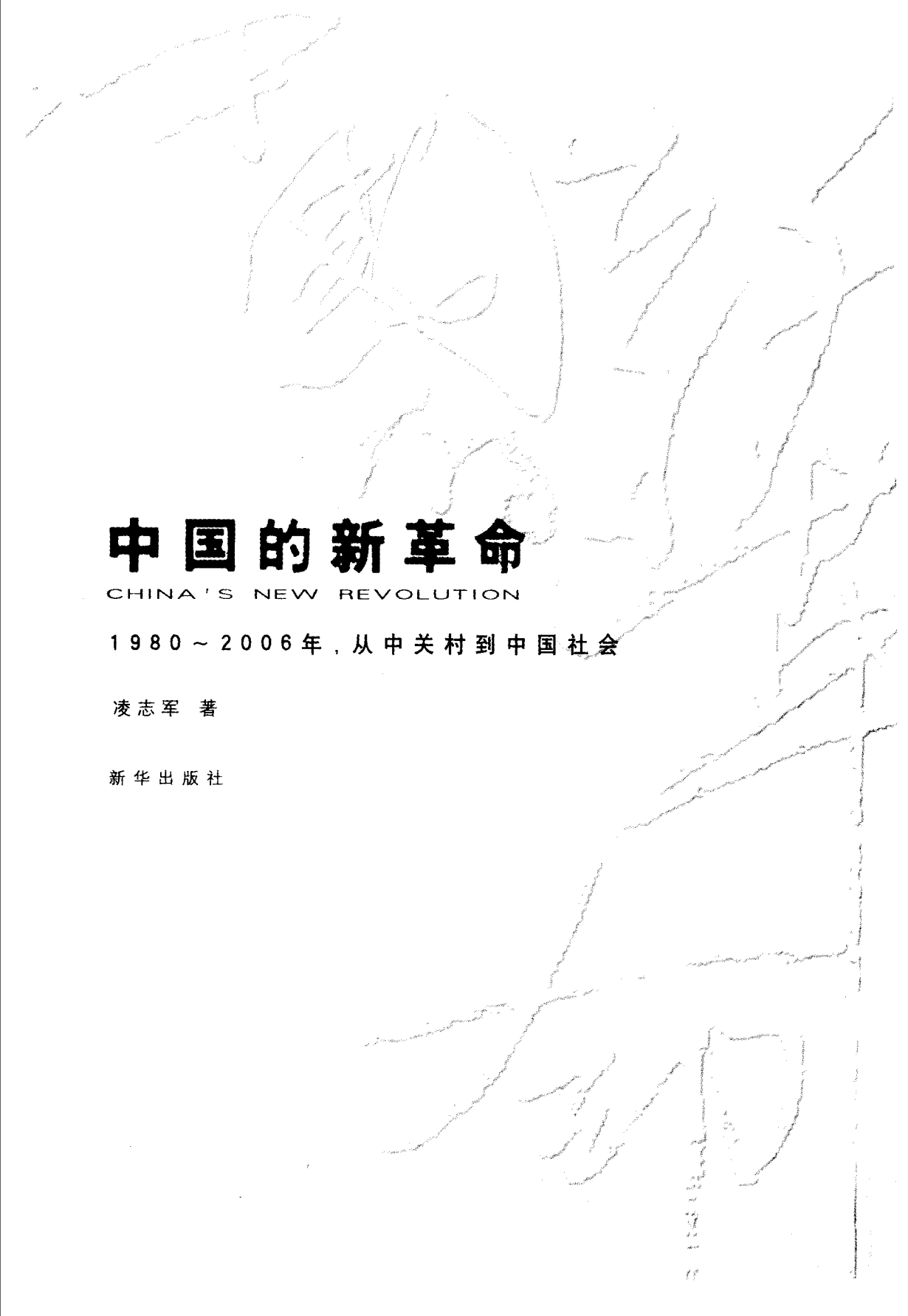
CHINA'S NEW REVOLUTION

凌志军 著

中国的新革命

新华出版社

1980~2006年,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



中国的新革命

CHINA'S NEW REVOLUTION

1980~2006年，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

凌志军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的新革命 / 凌志军著.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7. 4

ISBN 978-7-5011-7929-9

I. 中… II. 凌… III. 高技术-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概况-北京市 IV. F12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35844 号

中国的新革命

作 者: 凌志军

责任编辑: 许 新

封面设计: 蒋宏工作室

版式设计: 李 洁

图片提供: 北京中关村海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邮 编: 10004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天竺颖华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27

字 数: 450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1-7929-9

定 价: 38.00 元

本社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 (010)63072012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电话: (0316)3531388

《时代》杂志的封面故事在大多数情形下都是撩人的。

它在 2007 年 1 月 22 日的一期上,用了一幅血红色的图片来展示中国:一个巨大的五星升起在万里长城之上,金光闪闪,在风起云涌的大千世界投下万道霞光。光芒中跳出一行字来:“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出现”。(China: Dawn of a New Dynasty)。两位作者,《时代》杂志执行主编助理迈克尔·艾里奥特(Michael Elliott)和《时代》北京分社社长西蒙·艾里特(Simon elegant),为这期封面写出的故事长达 11 页,按照他们的描述,在这个刚刚开始的世界里,美国的力量会走下坡路,而中国的力量将上扬。中国正将它的经济影响转变为强大的政治威力。因此,“说 21 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一点也不夸张”。

这是好几年来世界范围持续不断的“中国话题”的最新表述。在这个世纪的最初几年里,全世界的人都在涌向中国。他们面对这个急剧变化的国家,每天都在问:中国的崛起会成为事实吗?它是一个和平过程吗?它会成为国际化浪潮的一部分吗?它会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吗?这个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和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会同西方发生冲突吗?

“你也要告诉我们一个中国崛起的故事吗?”在北京城中心一个写字楼的午餐厅里,玛萨·艾梅霞(Martha Avery)这样问我。她是个美国人,一个作家和翻译家,也是我过去的一本书的英文版译者。她对世界富有责任感,对中国充满好奇。但是也像全世界一样,她只能站在很远的地方打量这个国家,所以才会有此一问:“你能否告诉我们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正在努力。”我回答,“但我必须用我自己的方式。”虽然我将着眼于整个国家的大历史,但是在描述这个历史进程的时候,我的重点仍将是具体而微的人物和故事,我将由内部而不是由外部来观察。这一回我选择的样本是中关村。

就历史来说,中关村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缩影。在 20 世纪的最后 20 年,中国打碎了精神枷锁,战胜了饥饿,又让自己成为全世界最庞大的“制造车间”。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 10 年,它急切地渴望拿下新技术的高地,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这是新一代人的梦想,激励着整个国家再接再厉,进而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话题。它拓展了中国和西方大国的合作,也增加着彼此间的疑虑。而中关村之所以值得注意,就因为它是这条道路上的先行者。它的迄

今为止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国家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是因为它改变了自己。

我从1998年开始接触中关村，但是存心把它写出，是过去两年的事。在这之前，我用了大约18个月跟踪微软亚洲研究院，又用6个月调查联想集团。这两个机构都在中关村，相距不到两公里。一个是典型的美国公司，一个是典型的中国公司。那时我希望从公司内部来观察时代的融汇演进，而把大部分中关村的故事抛诸身后。直到2005年的某一天，我忽然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当时我来到双清路上，在清华创业园A座302房看到一个场面，有如新世界的混沌初开。这间屋子装着38家公司，每家公司只不过占有其中一个方格，由一张简易电脑台和一把转椅组成，和大公司里那种员工座位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在通常镶嵌员工姓名的那些地方，贴着公司名称，一律由普通道林纸打印而成，凌乱一片，让我想起满天繁星。电脑台后面坐着的那些人，个个年轻。他们是老板，也是会计，还是自己公司唯一的员工。只要花500块钱，就能在这里坐一个月，而他们在这里的时间通常不会超过半年。很多人失败了，但总会有人成长起来，扩大队伍，搬到楼上。那里有单间办公室，沿着走廊排列，是为他们这些人准备的。室内空间略大，可以摆下四五张桌，门外挂着一块公司招牌。站在走廊里，可以看到两排公司匾牌分列左右，笔直地伸到尽头。12个月、也许18个月之后，这些公司中的大部分也会垮台，但必定有几家继续成长，它们将搬到更大的写字楼去，占据整整一层。我对公司的创业景象并不生疏，可眼前这一切竟是闻所未闻。像微软和联想，它们都是拥有数万员工的庞大公司，但是说老实话，它们都没有“A座302房”那样让我感到震撼。我看到智慧、激情、勇气，看到压力和不确定性，看到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看到死亡和新生。

“一张桌”，“一间房”，“一层楼”，“一幢楼”。这个脉络直观地反映了公司的成长过程。然而新一代人的资本关系、技术路线和公司结构，已经和他们的前辈完全不同，节奏也更快。中关村的公司还是成者少，败者多。就像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它们中间有77%在3年内消逝，有90%在5年内消逝，有99%在10年内消逝。但这并不能阻止创业者前赴后继、一代接着一代地走过来。他们已经走了27年，直到今天。先行者为后来者提供了范例，既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关村的故事，也成为这个国家历史的一部分。

我意识到，我所看到的中关村的一些事情，为公众所不知，而公开舆论中很多深入人心的东西，又与它的本来面目相去很远。于是我便生出一个念头，想把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很多朋友对我的想法不以为然，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中关村有什么高科技？应当说，在对它的种种批评中，这

是客气的。我们都知道,还有人坚定地认为,“中关村就要死亡”。这个说法比较专业的表述是,它“已无力领导中国的高科技走向”;比较浪漫的表述是,它“只是一次性喷涌的死火山”。这种舆论自2004年春天以来特别强大,以至引发一场激烈的讨论。赞成者和反对者全都理直气壮,实际进程中则充斥着相互对立的证据。这让我们的故事更加生动,富有冲突、悬念和戏剧性,但同时也增加了我们讨论问题的难度。这些问题有:我们国家为什么出了个中关村?中关村为什么变成今天这样子?它的精神源泉来自何处?究竟是民族主义的伸张,还是西方思想的产物?它的商业体系是如何形成的?它掀起的三次技术浪潮是怎样影响整个国家的?民间资本为什么能够战胜国家资本成为主导力量?它也经历了原始积累的阶段吗?它有原罪吗?有欺骗吗?有无法无天吗?有勾心斗角吗?它的疆域如何拓展?它的法律怎样递进?它究竟是个新技术的圣地,或者只不过是大大集市?它究竟是技术第一,还是市场第一?究竟是科学家更重要,还是企业家更重要?为什么中关村的公司总是长不大?好不容易长大了又为何不能避免盛极而衰的命运?政府应当介入吗?应当干预吗?应当凭借行政权力去支持或者阻止某些力量吗?如果不应当,那么怎样制止它的混乱和无法无天?如果应当,又该以怎样的方式介入?老一代已经过气了吗?“海归”将要成为它的主力军吗?当跨国公司纷纷进驻之时,它还是小公司的天堂吗?它还是新技术的发源地吗?它还是国家创新的一面旗帜吗?它将会成为一个世界创新中心吗?也许,它的历史已经中断,将被上海深圳这样的地方取代?

就中关村而言,要想把所有问题都解释清楚是一件困难的事。生机勃勃充满变化的新世界总是不容易理解和把握。像中关村这样的地区,不仅中国独有,而且全世界难能有二。它的时间延续至今,跨越我们国家全部改革历程。从官方立场上看,它作为科技园的历史是从1988年开始的,然而在一些民间研究者看来,自从陈春先1980年自行其是地创办了第一家公司,中关村的新革命就已经开始。它的包容性之大,是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无法比拟的,以至它的人物太多,富人和穷人、博士和文盲,外来人和本地人、高官显贵和三教九流,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都有机会在这里谱写精彩篇章。它的事件纷繁复杂: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技术问题、环境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传统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人的本性问题。每个故事的结局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最重要的是,它的故事还在继续,所有人物都是“进行时”。世界每天都在变化,谁也不能预见他们面对变化将会如何行动。即使你整天生活在这里,要想说清楚一些事情还嫌所知不足。描述和评论活着的人们非常困难,实在是因为他们距离我们太近的缘故。我常常想,也许叙述一段一千年前的故事会更容易些。

我知道,如果我美化官方或者成功者,也许会失去公信;如果我迎合民间

舆论,也有哗众取宠之嫌。总之,无论唯上还是媚俗,都会离开公正从容的立场,使得人们更加简单化和更夸张地估价某些问题。我并不期望本书的描述能和中关村的正史合拍,那是历史家的事。我本人的职业是记者,对于人物和事件的取舍,更多的是出于记者本能。需要说明的是,我只是描述了中关村的最主要也是最有代表性的行业——信息技术产业,而对于其他领域的事只是一笔带过。我希望让读者了解这里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我想对读者说:“它在创新之路上蹒跚而行的曲折历程,大致上反映了中国崛起的真相。”这包括它的阳光和阴暗,包括它的英明之举和愚蠢行为,也包括它的混乱和秩序。

资料的来源是当事人的回忆、政府和公司的档案,以及公开出版物。中关村的色彩斑斓的历史既存在于人们心中,也存在于浩繁的文献中。为此我用8个月的时间在中关村调查。如果加上此前我对联想集团和对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采访,那么我在这里已经花费了32个月。我采访了大约300个人,包括企业经理、科学家、工程师、销售人员、会计、商贩、教师、学生、留学生、农民工、政府领导者。这些采访几乎全是一对一的谈话。他们相当坦率和真诚,给了我那么多的故事和思想。尽管如此,我知道记忆通常夹杂个人情感,而且会因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偏差,所以还用很多精力查阅原始资料。应当感谢中关村管委会和海淀区的领导者们,他们为我开放了两个政府档案室的全部文件史料。也应当感谢中关村园区志编写小组的那些专业人员,他们把自己掌握的资料毫无保留地让我使用。同时我还要感谢互联网以及日愈成熟的搜索引擎技术,它让我有可能高效率地掌握公开舆论中的有关部分。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我用“百度”搜索“中关村+盗版”的时候,就会显示至少40万个网页。所有这些,都成为我的重要参照。

由于资料浩瀚,泥沙俱下,所以对于事实的选择和驾驭要比收集这些事实更加困难。这需要眼光,也需要一些基本的价值判断,而价值准则却在随着国家的进步不断变化。昨天的天经地义,今天也许就会贻笑大方。我只是尽可能地以忠实于历史原貌的方式组织和叙述这个故事。初稿的长度远远超出预期,后来又经二稿、三稿、四稿、五稿,压缩其中三分之一篇幅,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不是整段整页地删节,而是逐字逐句地浓缩,为此用掉更多时间,只是希望读者在减少阅读负担的同时不至于丢失有用有趣的情节。

把这么多精力和热情投入这个话题,是我始料未及的。老实说,它影响了我的职业经历。我要学习很多新东西,还要让自己多年的阅历得到伸张,因此承担更多压力,获得新的表达空间。这在我本人也是一个成长经历。它很艰辛,但充满魅力。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写作者。在采访和写作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人来告诉我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如果有人认为我的叙述只不过是偏概全,有粉饰之嫌,或者过于刻薄,我只能说,依据

目前可以获得的资料和开放程度,这是我能做到的最接近于事实的描述。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仍是有关事实的。本书所有的内容,包括细节、数据、人物对话和心理活动,都有确凿根据,而非我的杜撰。我把极大精力用在事实的校正上,以免发生错误,但我深知本书时间跨度之长,内容如此浩瀚,有些间接得来的材料无法一一核实确认,即使是事件亲历者的叙述也难免发生偏差,所以发生事实方面的错误也许是不能避免的。如果读者发现其中有任何错误,希望能够向我指出,以便我能修正。

作 者

2007 年 1 月 30 日



目录

001 前言

001 第一部 白颐路(1980-1988)

002 第一章 黑夜漫漫 曙光在前

——我看到了美国。

021 第二章 破裂的金字塔

——我们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

034 第三章 电子一条街

——我的生活从此改变。

053 第四章 原 罪

——既是“倒儿爷”,又是“板儿爷”。

068 第五章 走进新时代

——此事宜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

083 第六章 曾是霜叶漫山时

——到底往哪个方向走啊?我们也蒙了。

097 第七章 中南海和世界潮流

——连宪法都要给改革让路,还有什么能阻止改革!

115 第二部 试验区(1989-1998)

116 第八章 昨夜风疾雨骤

——能逃过这一劫,真是幸运!

135 第九章 转变的年代

——我完成一个翻天覆地的革命。

152 第十章 出类拔萃之辈:第二代创业者

——我没别的本事,只是玩儿命想办法满足消费者。

166 第十一章 民族品牌! 民族品牌!

——如果这一关过不去,我们必死无疑。

180 第十二章 分裂之家

——科学提供燃料,商业才是发动机。

193 第十三章 英雄末路

——你可以得意,但不能糊涂。

207 第十四章 三次浪潮,潮起潮落

——中关村这个环境,是个东西就能卖,是个好东西就会抢着卖。

227 第十五章 市场又在召唤

——从现在开始,前10年是你的,后10年是我的。

244 第十六章 在信息时代的入口处

——凭什么?就凭我们这帮人的脑袋!

263 **第三部 科技园(1999-2006)**

264 第十七章 争论国

——抵制美国货,计算机除外。

278 第十八章 死亡和新生

——企业有生有死,但轮到我们自己头上,总是很沉重。

295 第十九章 全速前进

——它能成为下一个硅谷吗?

309 第二十章 互联网时代

——冬天不是即将到来,而是已经到来。

326 第二十一章 新疆界

——法无禁止不为过。

346 第二十二章 海归:改变中国的一代新人

——你怎么还没回国呀!

363 第二十三章 蚂蚁雄兵

——他们的单个是弱小的,但群体是强大的。

381 第二十四章 全球链

——中关村就要死亡?还是刚刚开始?

398 第二十五章 殊途同归

——我见过硅谷是怎么做的。我到中关村来亲自再做一遍。

418 尾 声

第一部

白颐路

1980-1988



第一章 黑夜漫漫 曙光在前

——我看到了美国。

在出现所谓“电子一条街”之前的两年里，白颐路被一种神经质的紧张气氛笼罩着。几乎人人都能看出，总有一些事情要发生了。这种预感就像瘟疫一样，在这条狭窄的街道缓慢而又坚定地弥漫开来。

紧张气氛来自那个闻名遐迩的大院子。用今天的京城地图来比照，这是靠近四环北路的一片土地，高楼林立，巨大的玻璃幕墙构成一幅幅夸张的几何图形，在蓝天的衬托下散发出眩目的光芒。而在当时，这里还是一片灰色建筑，被农田分割包围。它在行政上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包括计算所、物理所、数学所和电子所。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它一直都是这个国家的某种象征，神圣，宁静，单调，犹如一潭深水。而现在，也即1982年冬，竟由于两个人的冲突，荡起层层涟漪。

陈春先和他的上级管惟炎，成为这场冲突的两个极端的代表。前者是个理论物理学方面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可惜他的热情已经背离既定道路。当时他正在倾心力地经营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公司，自诩为“科技游击队”。作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管惟炎一点也不喜欢他的这个同行和下属，这种情绪在过去两年渐渐积累，直到开始怀疑陈春先的人品。他先是指控陈在牟取金钱方面的私利，乃至玷污神圣的科学殿堂，接着又要求审查陈的公司账目。审查行动在1982年3月开始，到年终还是没有一点停下来的迹象。

在这个命运攸关的冬天，关于陈春先和他的公司，白颐路上谣言纷纷。这些谣言每句话都是一项严重指控，在当时也并非没有一点根据，可是按照今天的条律和实情，却又是荒诞不经和可笑的。有的谣言说，这个人正在收买中国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其基本方法就是恣意发放“红包”，数额超过国家工资，又全部隐匿不报。有的谣言说，这个人把国家科研经费窃为私有。还有人声称，已经看到一份非法获取收入者的名单，牵涉至少20个科学家和大



学教师。攻击的矛头无一例外地指向陈春先和他的两个合伙者，纪世瀛和崔文栋。1983年元旦前后的几个星期，这三人躲在物理研究所院内那间蓝色的木板小屋里，个个神情紧张，坐立不安。“科技游击队的指挥部搁浅了”，纪世瀛在后来撰写的一篇回忆录中说，“蓝色板房坠入紧张而窒息的气氛之中……”

陈春先尽管神情沮丧，仍然坚定不移，期待他的时辰很快到来。他一直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对抗管惟炎所长代表的力量，可惜无法稳定自己的队伍。公司员工不是大学教师就是科学院的研究员，只在8小时之外投入进来，所以被叫做“星期日工程师”。对他们来说，职业的稳定是天经地义，辞职跳槽是不可想像的，所以他们在所长的压力下很容易地被瓦解了。现在，陈春先面前只剩下纪世瀛和崔文栋。三人相顾无言，彼此心照，谁都不知道怎样超越那个无形屏障。根据纪世瀛后来的回忆，当时场面“冷清得怕人”。最后还是陈春先打破沉默：“我说要干下去，你们俩也说要干下去。我们态度一坚决，就会有第四人、第五人。”

不幸的是，这个冬天陈春先期待的“第四人”始终没来。如果有人再次走进蓝色小屋，那也是偷偷来告别的。保存至今的公司档案中有一些文件，表明员工们纷纷退还津贴。这些钱原本只是他们辛勤工作的报酬，其数额为每人每月30元。但现在人人都说，这是“非法所得”，难免贪污之嫌，倘若不能如数退还，说不定什么时候警察就会拿着手铐出现在门口。

1983年1月25日是个星期二。破晓时分，物理所大院的西北角上忽然一片喧哗。声音涌进88号楼，穿过狭窄漫长的走廊，不出所料，是朝着纪世瀛家来的。他听到人声、掌声、脚步声，接着是敲门声，当即“吓了一跳”，而他的妻子则是“心里一紧”。这两年让这夫妻俩心惊肉跳的事情太多了，“天晓得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许真的是警察来了！”

慌张中的纪世瀛听清了几句话：“快打开收音机，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电台里说，你们是对的。”“这下子你们翻身了！”

他夺门而出，回到两个风雨同舟的伙伴中间。三人相拥一处，眼里挂着泪，就像噩梦醒来，互相询问这消息是不是真的。

千真万确，这是真的！大家终于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彼此祝贺，看着同事们围拢过来，时而拱手，时而大笑，脚下踏着有力的节奏，齐声高喊“解放了！解放了！”

日后那些研究中关村的历史家们，是应当为这个早晨留下一页的，因为它是一场新革命的无数转折点中的第一个。情势急转直下。陈春先，这个圆脸、小眼、面相柔和、没有棱角的南方人，这个在童年时代挨过饿的穷光蛋，这个在中国和苏联的蜜月时代赴莫斯科大学专攻核物理的留学生，这个衣衫不整、扣子常常扣错的邋遢鬼，这个在东方和西方的冷战时代为国家原子物理

科学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这个对抗上级因而被冷落的倒楣蛋,这个挂着研究员头衔却在捣腾小买卖的不务正业者,这个已有30年共产党党龄却挥舞着金钱引诱科学家红杏出墙的叛逆者,就从这时起,成了中关村的英雄。

然而当时没人想到他会成为英雄,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不过感到阳光回到心里,阴云一扫而光。这种感觉,只有在1976年10月6日那一天有过一次^①。可是他们对于骤然发生的变故还有疑问,不知究竟出了什么事。中国科学院正在流传一个新故事,说中南海知道了陈春先的遭遇,指斥管惟炎的行为是在压制科技人员的创新激情。在这个传言的散布者看来,媒体都是党的“喉舌”,国家电台既然敢于出头露面,那么这传言就算经过添油加醋,也必然会有根据。

陈春先回到家里,已是深夜,虽然很累,但很快活,心中唯有一个悬念挥之不去,彻夜不眠:“难道真是什么有来头的人说话了?”

这个早晨发生的事情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是我们将要讲述的这个故事的起点。在后来那些回顾历史的人们中间,陈春先常常被说成是“中关村第一人”。他的那个根本不像公司的公司一共存在5年,在技术方面乏善可陈,在管理方面一塌糊涂,但是在中关村迄今为止的历史上,它的确产生了一种颠覆性的力量,虽然是缓慢地扩展着它的影响,但其性质和强烈程度都是前所未有。它把科技人员送到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境地,让他们的热情和智慧在金钱、物欲和普通人的需求中得到满足,就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说的,是“一条新路”。

成为“第一人”的这个人,那年48岁。这个在中国科学院的一潭死水般的院子里扔进一块石头的人,肯定是个见异思迁的天才。表面看来,当时的情况似乎是一个技术人员怀才不遇而又不甘寂寞,所以背叛自己的上级和曾经信守的道路,自行其是。但实际问题是,这个社会蕴藏着一种不满足于现状的冲动。吞噬一切的国家主义传统和神秘顽强的个人主义欲望交织在一起,把世界上这个最庞大的人群塑造成如此这般。大多数人在深陷苦难之时都会逆来顺受,把自己的智慧和激情销蚀在没完没了的牢骚和抱怨中。只有这个人试图以一己之力来激发内心欲望,把它变成颠覆旧时代的力量。如果没有陈春先,古老的中关村当然也会瓦解,但那完全可以在另一个时间以另一种方式展开。他并非创业天才,经营和管理一个企业的能力也被证明相当拙劣。他的公司从来没有成功过。但他具有对新事物的感悟、杰出的奇思怪想、百折不挠的意志、惊人的对世界潮流的判断力。他是一个破坏旧世界的

^① 这一天,在主席华国锋领导下的一次行动中,逮捕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解决了“四人帮”的问题。



先锋,只是当整个国家都在大步前行开创新世界的时候,他才被无情地抛在后面。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了,在我们一向把帝王将相作为主旋律的历史生活中,小人物有时也会产生不可限量的影响。在此后 20 多年的风风雨雨中,中关村,甚至整个中国,都在这个人曾经指出的道路前行,但当时好像只有他感觉到这一点。

陈春先开创的历史,始于 1980 年 10 月 25 日。这一天,他创办了一个别出心裁的组织——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很难说它是一个企业,因为它在当时既无工商注册,也无法人代表,甚至连他的上级也被蒙在鼓里。纪世瀛说它是“偷偷成立的”,这并非故作神秘。因为当时他们如果报告上级,可以肯定不会获得批准。创业的动议最初只在三人之间商讨,性质类似于密谋。其中最富戏剧性的情节,是整件事情完全在中关村 88 号楼酝酿而成。这座建筑因为住着众多成就非凡的科学家而在当日中国享有盛名,其中包括陈景润、杨乐和张广厚。纪世瀛一家人住在一层最东头的房间,门牌“103”。那是一个以“振兴中华”号令全国的年代。记者们频繁出入此楼,把这群科学家弄到报纸电台电视台上去张扬,当做为国奉献的榜样。他们居然没有发现,这楼房里正在进行一项对抗国家体制的计划。

密谋者的队伍渐渐扩大,到 1980 年秋天已有 10 人。为首者陈春先是物理所一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里最年轻的研究员、还是中国有机半导体和原子能受控热核聚变研究领域的领先人物。此外还有纪世瀛,自诩为“严济慈的关门弟子”,如果这话有些夸张,那么他的“第一批参加原子弹设计的大学生中的一个”,以及“中国科学院里最年轻的工程师”,则是真的。那年他 38 岁,喜欢张扬,花样百出,夸夸其谈,而且还将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加偏执和疾恶如仇。有崔文栋,他是物理所高压电气技师;有曹永仙,力学研究所工程师;有陈首桑,电工研究所研究员;吴德顺,电子研究所工程师;罗承沐,清华大学讲师;刘春城,物理研究所技师;潘英,物理所会计;还有汪诗金,他是北京等离子体协会秘书长,也是这支队伍中唯一不属于中国科学院的人。

这天晚上,10 个人相聚在物理所,宣告成立“服务部”。因为是个周末,院子里空无一人,没有张灯结彩,没有鲜花,没有贺词,没有鞭炮齐鸣,甚至连个公司的牌子也没有。他们经过办公楼,再绕到核聚变实验楼的东北角上。这里有个小屋子,木版结构,铁门,原本是个堆放废旧实验物资的库房,现在经过一番打扫,就成了“服务部”的第一个办公地点。

根据学者们后来的考证,这是中关村第一个民营科技企业。当时的一切都像是美国硅谷学生创业故事的翻版:几个文化人,举债 500 元,还有一间旧仓库。仓库的窗户挂着一块蔚蓝色的塑料布,权作窗帘。从外面看去分外显眼,所以被他们叫做“蓝色小屋”。多年以后,“服务部”早已不复存在,陈春先已不在人世,“蓝色小屋”也在中关村的大规模拆建中被夷为平地,在人们的

记忆中消失了,只有纪世瀛仍旧对它一往情深。就在小屋将被拆除的那一时刻,他跑去为它留下照片。他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1991年2月5日。“没想到它会成为历史”,他逢人就说。遇到喜欢听他说话的人,他就绘声绘色地描述这个“历史”。

所谓“中关村第一个民营科技企业”,其实也是中国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当日我们国家的科技企业数以千计,不是“国家的”,就是“集体的”,还没有哪一家是属于私人的。多年以后中关村声誉鹊起,每年一度在白颐路举行盛大“庆典”,成为惯例。在那些情绪激昂、如痴如狂的日子里,我们在这里看到人流如织,熙熙攘攘,他们是来自全国的官员、学生、工程师、经销商、消费者和媒体记者。大街小巷彩旗招展,巨大的条幅横跨在马路上方,上面写的是,“中关村——伴您进入信息时代”。因此中关村不仅被描绘成一个电脑乐园,而且还是一个把整个国家引向新世界的开拓者。陈春先的别出心裁是中国历史的合乎逻辑的延伸,这一点暗示对中关村不是没有影响的。甚至“中关村”这个名称本身,也是借助于这种逻辑才超越了地理的局限。

中关村偏居京城西北一隅。好几千年以来,这块介于汉族聚居区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土地,一直置身于中国经济发展和文化主流之外。它在行政上隶属于北京市海淀区,地理位置则是永定河冲积而成的一片小平原。河水经年累月切割而成的宽广河谷,把它造就成洼地和台地两种地貌,自南向北渐次沉浮。根据已经出土的文物记录,这里在5000年前便有人居住,一直都是古代中原通向塞外的一个驿站,只是由于紧邻北方强悍好战的部落,少有人烟。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公元17世纪,发轫于东北的满人爱新觉罗家族挥师南下,确立了自己对汉族人的统治。他们本来只是些优秀的军事征服者,现在却向被征服者学习农耕文明,削高就低,开垦稻田,拓展湖泊,雇佣汉族工匠建起规模庞大的皇家园林。经过至少100年的刻意扩张,国家出现一片繁荣,也即所谓“康乾盛世”。海淀进入它的鼎盛时期。后世所谓“三山五园”初具规模^①,又经历代皇朝修缮,日渐辉煌。这些皇家园林在京城西北角上依次展开,融于农家景色,形成田中有园、园中有田的风光。帝王把自己的很多时光消磨在这里,甚至敕令朝政随之移来。内阁索性在海淀另立办公中枢,官员们在御苑附近租屋居住,遂使此地成为皇家第二权力中心,世人把它与京城中心的紫禁城并举,称为“双城”。19世纪中期之后,中国在同西方人的战争中屡战屡败^②,元气尽失。导致国势衰微,军阀混战,京西皇家园林日渐

① “三山”:万寿山、玉泉山、香山;“五园”:圆明园、春熙园、澹漪园、静明园、静宜园。

② 包括1840年、1848年与英国人的战争、1860年与英法联军的战争、1894年与日本人的战争、1900年与八国联军的战争。

破败,昔日的辉煌与奢华一去不返,其惨淡之像直到今天依然保留在圆明园中。中关村逐渐沦为京城官僚和太监的坟场,其间散落着三五守坟人家^①。

中关村似乎已是历史的弃儿,只在偶然情形中成为胜利者的匆匆过道。就像300多年前的农民领袖李自成挺进皇城一样,解放军也是踏着这片土地到达京城中心。毛泽东进入北京后的第一个居所,为香山脚下的“双清别墅”。这位党的领袖还曾想把自己的权力中枢建立在这里,只是因为属下力劝,这才搬进城市中心。

中关村距离这个国家的政治心脏——天安门广场,只有14公里,而在心理上的距离却要遥远得多。1949年10月,当广场上万众欢呼共和国的成立时,这里仍是一派冷清荒凉。大多数追溯这段历史的人认为,那时候中关村的人家不过20余户^②,以农为生。村落明显保留着世代守坟的格局,房屋散漫,依坟而建,生死相依,百废待兴。这局面恰是当日整个国家的写照。

共产党成为国家的领导者,但是它没有西方国家政府那样的行政经验。当日国家人口众多,没有大城市,没有大工业,没有资本,没有技术,工厂和机器都是从资本家手里没收过来的。农民虽然有了土地,但却食不果腹。除了发愤图强的雄心、万众一心的献身精神之外,那时候我们的国家什么也没有。然而靠着坚定意志和支配资源的绝对权力,中央政府开始推动国家去追赶西方列强。党的领袖毛泽东号召人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说了无数鼓舞人民斗志的话,有“自力更生”,有“超英赶美”,有“人多力量大”,但是所有这些都比不上一句话那么经典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特征。当毛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时,他说,他希望放眼望去四围是一片工厂的烟囱。不用说,这话里充满了那时中国人的雄心和梦想。从那以后的30年间,这座城市的执政者有过无数愚蠢的决策,比如拆除老城墙,肢解老社区,把摩天大楼一座座插在四合院中,让城市一圈一圈地向外扩张,这一切都给后来的政府和百姓带来无穷烦恼。但是有一件事他们做得异常英明,那就是坚定不移地把大学和科研院所集中在中关村以及它周围一片土地。

作为“强国梦”的一部分,共产党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成立中国科学院,进而在京城西北的城乡结合部建设起一座“科学城”。“科学城”从一开始就是军事行动、政府计划和“乌托邦式理想”的奇特混合物。那时候老城之中居民稠密,稍有空隙,便被军队和政府机关占据。中央政府决定把“科学城”和“大学城”放在这个人口稀少的地区,设想有朝一日把这里的人口增加到6

^① 据王珍明考证,当时中关村在地理上的位置,“东起蓝旗营西墙,约当今北京大学中关村东墙处;西至旱河,约当今北大化学楼;北至加速器实验室北一线;南抵海淀通往保福寺的小道附近,约当今北四环路南侧。”

^② 但是一个叫宓方的研究者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他指出,在1949以前,中关村是个有70户住家、276口人的自然小村。周围的坟地占了土地的30%多。